

觅城市的前世今生——问市民梦归何方？

车 弓

“运河是一条物质之河，千百年的流淌改写着南北中国的历史；运河又是一条精神之河，千万里的求索承载着民族的气节。”

“缚住了一条河流，就缚住了一个城市的底蕴；同时，也缚住了一个城市现代人的灵魂。”

——题记

大家好，这次市水文化研究会沈季民会长和我把大家请来，不是做讲座，主要还是讨教。也就是说我只是抛砖引玉；把砖抛出，玉引进；砖就值了。

“运河是一条物质之河，千百年的流淌，改写着南北中国的历史；运河又是一条精神之河，千万里的求索，承载着民族的气节。”

坐落在运河出海口甬江畔的“冰厂跟”，作为一个城市地理坐标，已经矗立了好久。可是要作为城市的文化坐标，可能还要待好久。多久？谁也不说不清；因为每个市民对城市与价值标准理解不同。每个市民心目中，都有一座属于自己、而区别于他人的城市

我先汇报一个概念，就是城市文化的标准是谁定的？通常的说法是：城市文化是市民的文化，是由市民定的。其实不然；许多城市都是由某个领导或专家确定，或者政府发一个文件，确定做

某一件事，城市的“精神坐标”就确定下来了。这样的例子太多，尤其在当代，这儿恕不展开。

这种文化现象，大多是书面形式，有论文论据论证；我们不妨定义为“雅文化”。但这不是城市文化的全部，从历史上说，城市深层次的文化定义，是由城市千百万的市民，在千百年流淌的历史长河中、通过时间的发酵、或由一个代表人物“出面一呼”形成的。

如汤显祖功名不就，到宁波向名士屠隆求教艺文，回江西途经徽州，为那儿勃勃开发的“商务”深有感触，写道：“欲识金银气，多从黄白游；一生痴绝处，无梦到徽州。”后就成为徽州与徽商的金字“招牌”。

这种由“市民”做成“招牌”，由某个名士“说”出来的城市“文化”现象，也可以称之为“俗”。

在此的“雅”与“俗”；我并无贬褒之意。从长远眼光来看，后者似乎更靠谱一些。

我为何提此问题？是想说清楚这种“雅”、“俗”之分，其实都可以促进城市文化的建成。如“它山堰”，如果没有王元玮坐着“位置”，可以成吗？“俗”文化虽在民间悄无声息、在市井巷陌、村庄坊间约定俗成地形成，经过千百年时间的发酵，就可以堂而皇之地“登室入堂”，成为城市文化的主流。如“妈祖信俗”，不就在民间，经过上千年的“发酵”流行开来的吗？

回到原题上来，这与冰厂跟兴衰有何关系呢？

有的，而且关系大着哩。就现象看，把“冰厂跟遗址”与城市文化联系在一起有些怪，“冰”是纯物质的，而且在人类生产、生活中属于“小宗”。但只要我们把十七、八世纪以来，宁波人储冰、藏冰的“冰文化”内涵，与城市的生产、生活与发展内涵结合起来，你还真会发现这“冰厂跟”遗址，在城市文化中占了一块很大的内容。

就多数市民来说，一提到城市文化坐标，就会想到它山堰、天一阁、庆安会馆和白云庄、鼓楼、天封塔、保国寺、天童寺等等文化景点。其实就宁波的文化坐标来说，上世纪前半期是灵桥、江夏街；下半期江夏街不再那么重要，把“老江桥”地位提升了上去。到了本世纪，可能还是新建的老外滩与天一广场的“知名度”更高一些……

但在 16 世纪延伸至上个世纪，“冰厂跟”一直在人们的心目中，占据了重要的地位。

先掉点“书袋”说与大家听听——

宁波上规模制冰起始于明朝。据明嘉靖年间松江府昆山人郑若曾（字伯鲁，号开阳，明代著名的布衣军事家、战略家）在《江南经略》中记载：“在明代，宁波的黄市洋一带就有四五座‘冰荫’（即冰厂）专为渔船供应冰块。”

当时浙东习俗是将所得鱼货用盐来腌制；而不是像如今一样流行冰鲜，所以冰厂的数量应该也是有限的。

清人徐兆昺所著《四明谈助》这样描述“冰窖”外形：“冰厂窖田覆草，中脊建瓴，前后峻削，如马鬣封然，不至积而渗漏，地上籍之以草，通长沟，冬月抬冰至满，必使封固周密，旁不通风，下可泄水，庶无消化之患。至夏日应用，每日江船运开，诸厂皆然，连绵十余里不断。”

这是《四明谈助》对宁波运河入海口甬江南岸原始“冰厂根”的描述，可想那时的冰厂，已成为宁波城市文化的一道风景。

清代诗人李邕嗣也对浙东一带冰厂满怀豪情地吟诵道：

“鱼鲜五月味偏增，积冻中舱气自凝。

未出洋船先贵买，几家窖得一田冰。”

这些都是国人眼里，洋人对城市文化的“嗅觉”，也许比我们灵敏些。

这儿我不得不提，在初涉宁波的洋人眼里，宁波甬江冰厂跟的“万亩冰田”景况，也许比当年庆安会馆与天一阁等文保景点更为“晃眼”。

19世纪初的英国摄影家约翰·汤姆逊的游记《中国与中国人的影像》中，曾以优美的笔调描述初夏时节轮船在甬江航行的见闻，提到对他来说眼睛为之一亮的新事物：“江岸上那一排排连绵不绝的冰屋，里面贮存的冰用于夏天的时候给鱼保鲜……”

这位约翰·汤姆逊说的“冰屋”，便是“老宁波人”口口相传的“冰厂”。

在 18 世纪将茶叶自中国引入印度的苏格兰植物学家罗伯特·福钧，来此时也对甬江南岸绵延十里的“冰库”，充满了好奇：“乍看上去，很像英国的干草堆。就这样一个简单的构造，竟然可以在夏天很好地保存冰块。”

他又说：“1844——1845 年冬天，是一个暖冬，这一地区的池塘、运河里很少或者根本就没结过冰。冰库自然也没有新冰入贮，但很多冰库还是贮存了大量的冰块。这些冰却是前一年冬天存放在那儿的，就这样，市场上有冰块出售。”

最有说服力的应是当地史志的记载。

《鄞县通志·食货》记载：民国初期（1911 年）“甬江渔船当渔汛期至，由奉化江扬帆而来，经过东乡、梅墟，必购冰贮舱下，使船载重始可浮海。及在定海洋面渔获而归，将贩甬上之渔行也。又经过其地，则再冲冰，使鱼味鲜美，且可以持久。故梅墟一带沿江十里之地，栉比而立者，皆锥形草盖之冰厂。”

又记：“晚秋收获后，灌田以水，支木建厂，茨草其上，掘地为洼，用以贮冰。十月以后，天寒凝冰，早晨二三时，乘月光，将由所结冰藏至厂中，至翌年春间，冰期始断，乃扃门待售于冰鲜船。”

据民国二十四年（1935）《鄞县通志》记载：“梅墟一带沿江十里之地，冰厂栉比而立，自和丰纱厂以东至镇海方向，鼎盛时，常有数千座冰厂。”

有一份地方资料这样记载：“当时鄞县人口为 68 万，而直接或间接从事冰业的不下万人。”

浙江省立民众教育馆有一份调查指出：1936 年鄞县“下白沙村梅墟地方，和丰纱厂东沿江数里”：“有大小冰厂二百计余”，“可容纳冰一万二千担至一万六千担者有五十余厂，可容纳八千担至一万担者有七十余厂，其余可容冰四千担至七千担。”

《中国实业志·浙江省卷》还详细列举了当时鄞县崇茂记、葆记、楚记、漠记、秀记、运记、采记、兰记、舜记、梅号、南号等 20 家的冰厂的资本和地址情况。此外，镇海、定海、象山等地，也有众多的冰厂。

至此，笔者粗粗算一下，这时宁波的冰厂估计有近万座，占地约万亩，在甬江南岸绵延约十里，从业人员超过万人，已名符其实地被称为浙东第一产业。

翻阅过这些资料后，不知你会想些什么呢？反正我想了一个简单、却与历史相关的社会学问题。就是当时鄞县 68 万人口中，却有约 1 万人从事冰业生产。

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呢？16 年前我采访慈溪市委书记。说起慈溪的民营企业壮大发展，他给我说了这样一个数据：“全市常住人口 104 万，出外从业、读书、出国人口近 10 万，外来打工人口

100万；在工商注册的民营企业9600家（那时的数字，现在为14000多家），这样算一下，本地人口约45人（连外来打工人口150人）就拥有一家企业。”说完，他笑着说：“密集度够高的，本地人口除去老少妇孺，差不多每10人就打理一家企业。”

相比当时鄞县从事冰业人员（差不多68人有一个）。如果除去老少妇孺和其他职业者，青壮年也差不多12——15人中，就有一人从事冰业。

那么多冰厂，产量有多少呢？

按《中国实业志·浙江省卷》统计：“大小冰厂二百余家，可容纳冰一万二千至一万六担的五十余家……”好了，余下我不必统计了，仅此五十余家，可供冰在60万担至80余万担……另外还有150家哩，产量却超过80万担。

如此说来，仅和丰纱厂至梅墟200余家，可供冰160万至200万担间……

惊艳了吗？当时宁波还没开辟现代工业，如此巨大的产冰量和职业冰工，在全球沿海城市中也绝无仅有，“当惊世界殊”吧？

这下你服了吗？中国是个农业国，我国的工商业的兴起（特别是开厂与办厂）应在18世纪中后期至上世纪初。那时的宁波，传统的说法是以永耀电厂、和丰纱厂和面粉厂等企业为荣的“三支

半烟囱”。相较于宁波、舟山“东海传统渔业”，算是“小巫见大巫”了。

宁波冰厂遗址不仅规模巨大，而且是具有组织结构、资本和规模的近代企业。据1927年5月21日的《时事公报》题为《冰船业同盟会成立》的报道：“本埠冰船业工人同盟会假江东二眼桥开成立大会，到会者三十余人……推选余宝裕、范阿朝、林银仁、金阿多、范尚水、钱国华、林云生七人为执行委员。”

另载：“下白沙对岸梅墟地方，和丰纱厂东沿江数里，有无数累累方锥形之草棚者，即天然冰厂也。此项冰厂，多为当地农民所营，因其无需巨大资本，又可收相当之利益，故普通有水田七八亩、资本七八百元者，莫不建造一厂，以收其利。此种营业，系来集冬季水田中所结冰块，挑贮厂中，俟结冰期过后，取出售与渔船及冰鲜船应用，当其盛时，梅墟一带有七八百厂之多。”

有资产、有资本，还具有行业工会组织，这些却是在全国、而且世界沿海城市中罕见的。解放前夕，上海也有冰厂，叫“冰厂田”。两年前我为冰厂跟撰写“冰文化展”大纲时，特地跑去参观。规模、产量都无法与宁波比拟。

够了，我如此喋喋不休地向领导与同行们汇报“冰厂跟”的情况。是我与战友合伙“拣”起这地方，搞文学馆或说读书会的“野心”所在；但行动中却是有些小小的“私心”。原始想法也就是在这江边静谧之处，摆放一张“可供读书人聊天阅读的书桌”；

说得雅一些，就是“一碗茶，两杯酒，邀三朋四友，纵论四季春秋”，搞个“读书会”，有地方吹吹城市文化的“牛”以娱晚年。

但是，快两年下来，我觉得有些对不起“冰厂跟”这块“风水宝地”，“牛”吹了，研究城市的“风”也就放出去了；但我们对宁波城市文化仍不了解；换句话说也就是：“成果寥寥”。因为我仍无法知晓宁波文化特质是什么，或宁波是一个什么样的城市？”

多久了，我在睡梦中，常会重复由来已久的设问：“来时匆匆，不及问路就投胎托生；难道还要去时忐忑，不知何故于此城白活经年？”

是的，到了我们这年龄，是该为灵魂找到回家的路了。

这就是：必须细细追问我脚下的这块土地，她到底拥有何种特质的精神？

30年前，我以宁波属下县级市文联主席的身份，陪同一个日本濑户陶瓷株式会社代表团造访上林湖越窑青瓷。在湖光山色之间，我们交流了许多关于陶瓷的学问，大多忘记了，但其中有一段话至今记忆清晰。

团长山本说：“中国较之日本，历史上最伟大的帝王有两位，一是修筑长城的秦始皇，二是挖掘运河隋炀帝。遗憾的是这两个王朝，都是短命的，可是他们创造和开拓的长城和运河，却成为中华民族古文明的象征！”

山本长什么样子，我已记不清了；但这话却至今回响在我耳畔。

书读多了，人就会变傻。30年前，这话对我来说应是骄傲。

是呀，长城、运河；世界上绝无仅有、纯国粹的人类物质文化遗产，不仅小日本没有，就是美利坚、俄罗斯至今在世界称王称霸的国家都没有。当然，长城有，长度不一样。运河也有，苏黎士、巴拿马、莫斯科、彼得堡等，也是长度不一样，在全长 3300 公里（一说 6000 公里，通航 2700 公里）的中国大运河面前，显然不是一个等量级“选手”。而且上溯时间跨度也不一样。

然而，问题出现了，为什么秦始皇、隋炀帝这般的“千古一帝”，历史上却偏偏是万人唾弃、千人共诛之的“暴君”。

这似乎是一个悖论，却是历史真实生命所在。

去年由宁波市世界文化遗产管理保护中心、市水文化研究会、海外宁波人研究会等单位主协办，宁波出版社甬江书房和甬思读书会承办的“运河文化讲堂”和“作家、艺术家走运河”活动，目的就是想重铸城市的文化精神，“让宁波走向世界，使世界了解宁波。”

由此说到城市文化，也就是我们今天需要研讨的问题。“冰厂跟”作为代表宁波某一时期“地标文化”，给研究城市文化提供了一个具体的“入口”。

目前，“套”在宁波这美丽海滨城市的“口号”与“标签”很多。什么“天下旅游、××开游”、“书藏古今、港通天下”、“东亚文化之都”、“智慧城市”、“慈孝之城”等；但宁波到

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城市？有着什么样的文化特质？似乎又说不上来。

是这些“口号”与“标签”错了吗？也不是。从城市文化含义说，也无绝对的对与错。宁波作为对外开拓发展的城市说：市民及外地旅客短期摸不着头脑，也是可以谅解的。但是，如果我们能响亮地提出城市文化的“口号”，岂不更好？

就我的理解，宁波与众不同：就是这条世界公认、特殊的“黄金水道”，向人类亮出和畅开古老东方的全部资源、包括史前的文明。

与全球其他沿海城市相比，宁波至少有三处“亮点”——

一是世界上最早的原始船舶寄存点，也就是说宁波是世界上最早诞生船和东方原始海洋文明的区域，7000年前的河姆渡文化（现在应是井头山），是人类最早吹响由河流向海洋开发的号角。我们今天需要研究的世界或东方“河海文明史”，当以河姆渡文化作为起点。

二是世界上最早产生市民和商贸市井文化的城市之一，文化历史底蕴深厚；这儿为何加上之一，因为就中国古代（唐宋时期）商贸港口城市就有四处，即扬州、宁波（明州）、泉州和交趾（今越南）。而那时，西方（包括鹿特丹）还没有成型的码头与商贸市井开发。

三是全世界所有的港口城市中，宁波舟山港不但吞吐量大（现为全球第一），而且自古至今，占有腹地最为辽阔，3300公里或说2700公里的中国大运河，就是她汨汨流动的大动脉。

这在地理经济学的角度说，是当之无愧的世界第一；也在为我们今天研究地域文化、进一步改革与向世界开放，打开一个窗口。

我在组织参与作家、艺术家走运河时，写的一篇稿子中曾说过：“缚住了一条河流，就缚住了一个城市的底蕴；同时，也缚住了一个城市现代人的灵魂。”

当然，城市地域文化的研究，是一个较为复杂的问题，有着多种因素组成并具有随社会主体意识改变而改变的特性。

以上所述，仅个人一孔之见，旨在引起在座诸位的重视，如果大家都能畅开胸怀，就城市精神主题，聊聊城市的文化走向。那末，对这座美丽港城，无疑是一种福音。

因为，在21世纪的今天，正确城市文化定位，可以直接影响“领导”决策，并且关乎我们正在企盼的“明天”。